

# 中國中產階層的國際觀

● 朱東飛

自改革開放以來，作為社會轉型產物的中國中產階層正急劇成長，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以至於海外媒體都開始驚呼中國已經進入中產階層時代。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中國社會階層與利益團體呈現出多元與多樣的格局。作為社會轉型產物的中國中產階層正急劇成長，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以至於海外媒體都開始驚呼中國已經進入中產階層時代<sup>①</sup>。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政策制訂的結構正在經歷多元化、分權化、制度化和專業化等意義深遠的變化<sup>②</sup>。中國在外交觀念與實踐領域正發生悄悄的革命，社會因素在中國國際關係中的地位逐漸上升<sup>③</sup>。中國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一方面使外交決策環境日益複雜，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動着中國外交的悄然轉型。中國在全面融入國際體系、推動國際合作，不斷走向多邊主義的同時，也加大了公共外交的力度，通過各種積極手段宣傳外交政策，尋求公眾對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如何保持外交的持續性和連貫

性，實現中國外交的目標和任務，已經成為中國外交面臨的重大課題<sup>④</sup>。作為中國社會變遷進程的參與者、見證者和利害相關者，中國中產階層是怎樣的一個群體？它是如何看待國際事務的？又如何影響了中國外交？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試圖提供一個演繹的分析方法。

## 一 中產階層興起的背景

中國對外關係領域的變遷與轉型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對它的把握首先脫離不了中國三十年政治經濟變遷的國內背景。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變遷主要表現為雙重轉變或雙重轉型：一是結構轉換，即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表現為工業化；二是制度轉換，即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表現為市場化。中國社會轉型是兩重變革交互作用的

\* 筆者感謝導師蘇長和教授對本文選題及寫作過程的指導與建議；感謝李少軍研究員、俞正樑教授、朱立群教授、朱杰進博士、朱中博博士的鼓勵和指導；但一切文責由本人自負。此外，本研究還得到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第三屆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的資助。

結果<sup>⑤</sup>。在西方，工業化及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是中產階層產生的社會背景。然而，工業化本身並沒有對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中國社會階層變動產生必然的影響<sup>⑥</sup>。例如，在1949至1978年的三十年間，中國的工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年平均增長率在7%左右，但中產階層的成長卻遭到遏制。而市場化帶來了私有產權的出現和國有部門之外新生的非國有部門，從而導致了社會分層的變化。事實上，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和成長，與1978年後出現的中國社會由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市場化轉型有着最為直接和密切的聯繫<sup>⑦</sup>。

有關1978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市場化轉型，國內外社會學家提出了各種理論模型。綜合近年來有關國家社會主義轉型的各種理論思想，周雪光提出了「政治與市場共變」理論，這裏「政治」是指「與現存和將出現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相聯繫的政治領域的利益表達類型」；「市場」是指「資源分配和經濟交易的模式」。在中國，國家啟動改革和市場推進是經濟轉型的兩個主要動力源泉，這兩個動力促使政治和市場在互動中共變。政治和市場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國家在建立制度規則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市場正是在這些制度規則中運作的。「再分配國家的撤出並不意味着市場的推進」，「新制度出現通常採取一種與現存規則、權威關係和可用的解決方案相結合的方式。」<sup>⑧</sup>中國社會並非簡單地由再分配經濟向市場轉型，中國市場轉型是在政體連續性背景下進行的一場漸進式改革，許多重要的改革和轉型過程是使用變通的方式實現的<sup>⑨</sup>。

因此，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新的社會分層機制是市場與政

治共同變化所產生的新制度。這樣就產生了一個二元分層形式：一個以政治原則主導的新制度參與資源分配的「政治分層」；一個以市場原則主導的新制度參與資源分配的「市場分層」，可以簡稱為「政治—市場」二元分層模式。這兩種分配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後共存，並在不同資源領域形成相互競爭、強化或適應的關係，導致了新的社會資源配置格局，在階層分化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 二 中產階層的「二元模型」

目前，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分層觀：一種是定性的階級劃分思路，另一種則是定量的層化思路。前一種思路假定，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狀態：某些人佔據資源，其他人不佔據資源，佔據資源的人利用其資源優勢控制沒有資源的人，可能對他們進行剝削、壓迫，造成社會矛盾、衝突；相反，後一種思路假定，社會上的人都佔有資源，其差別只是佔據多少而已<sup>⑩</sup>。在中國國內正在齊心協力共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很難再說哪些人或階層不佔有資源，而應該說他們佔據的資源有多少。

造成個人佔據社會資源不同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改革開放以前，從社會整體來看，社會成員在資源分配機制中位置的不同導致其獲得不同的社會資源。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主要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則是「政治—市場」二元分配模式。從社會個體看，社會成員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不同而造成其不同的資源擁有量<sup>⑪</sup>。

一般來說，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中，職業同社會資源分配密切相關。社會成員由於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和

「政治—市場」二元分配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後共存，並在不同資源領域形成相互競爭、強化或適應的關係，導致了新的社會資源配置格局，在階層分化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產階層內部各社會群體之間在不同的社會資源上存在着不同的獲取能力，有的更加依賴政治分層，如基層公務員；有的更加依賴市場分層，如外資企業白領。

機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分工，從事不同的職業，而不同的職業在社會資源分配機制中的位置又不同。因此，職業成為一種反映社會資源分配的指標。例如，在發達國家，職業角色的差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sup>②</sup>。但這一方法並不適用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深厚的「重關係」文化傳統和社會急劇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大家庭成員內部普遍存在相互接濟現象；相同的職業處於不同所有制的個體，在收入、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反差。而對上海地區「白領」的實證研究發現，他們仍未有一種以職業為中心的意識<sup>③</sup>。因此，對中國社會階層進行劃分不能單純地依據職業。

李春玲基於訪談發現，「人們憑藉個人社會經驗和主觀感受對人群進行的分類，主要是依據三個方面的標準：即是否有錢、是否有權、是否有文化」<sup>④</sup>；用社會學術語可以表述為：物質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而資本是指「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sup>⑤</sup>。因此，中產階層就是指「社會成員按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劃分處於中間層次的社會群體」<sup>⑥</sup>。在人力資本方面，中產階層基本上受過大專以上學歷教育，主要以腦力勞動為主；在社會資本方面，中產階層通過社會網絡資源對其授權的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調度、控制和支配權；在物質資本方面，中產階層通過合法的職業勞動，其收入和財富水平位於社會中間檔次，並且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費。

社會分層是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果，而社會資源的分配機制又決定着社會資源如何分配，即社會資源的分

配機制決定着人們通過何種渠道獲取何種以及多少資源，所以，社會資源的分配機制決定着人們的階層地位差異<sup>⑦</sup>。實際上，在「政治—市場」共變機制下的社會，每個人都在不同的機制下得到了相應的社會資源，只是數量上存在着差異。一般來說，中產階層內部各社會群體之間在不同的社會資源上存在着不同的獲取能力，有的更加依賴政治分層，如基層公務員；有的更加依賴市場分層，如外資企業白領。那些主要依賴以政治原則為主導的新制度獲取社會資源的中產階層，可以稱為「政治型中產階層」；而那些主要依賴以市場原則為主導的新制度獲取社會資源的中產階層，則可以稱為「市場型中產階層」，簡稱為「政治—市場」型中產階層二元模型。

### 三 中產階層的國際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觀念（即中國如何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的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的主導方向是融入主義的，即與國際社會主導規範接軌」<sup>⑧</sup>。但由於在獲取有關公眾觀點的數據方面還受到嚴格限制以及普遍漠視公眾觀點與外交政策的相關性，有關中國公眾的國際觀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在中國外交研究中還是一個新領域。而在發達國家，有關公眾觀點與外交政策關係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在公眾對待外交政策的態度上，西方學者展開的大量經驗研究表明，諸如教育、職業、收入、年齡、性別、獲取海外信息等這些社會人口統計屬性，將會影響個體對待國際事務的態度<sup>⑨</sup>。而盧春龍、田野對中國城市居民對

經濟國際主義態度的調查研究表明，教育、年齡與海外親友聯繫顯著影響城市居民對經濟國際主義的支持，而職業與收入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並不明顯<sup>⑩</sup>。

同低收入階層相比，中國中產階層受教育程度明顯較高。有學者認為，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關注國家的政治活動，現代政治意識愈強，政治疏離感愈低<sup>⑪</sup>，從而更容易理解和感受國家事務和國際事務；而他們對地方事務、國家事務和國際事務的興趣又有助於其形成明確的國際觀<sup>⑫</sup>。因此，同低收入階層相比，中產階層具有較明確的國際觀。

研究表明，在美國那些教育水平較高的人、收入較高的人、年輕人、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較傾向於美國參與國際事務，而中產階層更是具有自由主義國際觀<sup>⑬</sup>。同樣，日本、韓國等國家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中產階層也大都傾向於自由主義國際觀。於是，許多人也就認為中國中產階層也會傾向於自由主義國際觀。如江憶恩(Alastair I. Johnston)認為，相比低收入階層，中國中產階層對待國際事務的態度更傾向於樸素的自由主義(proto-liberal)<sup>⑭</sup>。但是人們恰恰忘記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並不同於西方，並非像西方中產階層那樣是同質性很高的白領階層。中國中產階層是個「雜領群體」<sup>⑮</sup>，主要表現為新、舊中產階層同步發展，又存在於不同的行業、職業和所有制之中<sup>⑯</sup>。國家或政府的力量通過直接和強有力的干預，在塑造和重塑中產階層方面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國中產階層內部存在着兩大類：政治型中產階層與市場型中產階層；因此，中國中產階層的國際觀並非同一的。

較高的受教育程度促使中產階層更傾向於支持中國參與和融入世界。其理由是：第一，受教育使人們接觸到更多的普世文化，對外部世界傾向於持溫和與成熟的觀點，而對自己國家的不足之處多持批判觀點<sup>⑰</sup>，從而有助於他們支持中國融入世界。第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較明確地認識到歷史上中國閉關鎖國政策的危害，從而有助於他們支持中國實行開放政策。第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傾向於支持自由國際貿易和全球化<sup>⑱</sup>，從而有助於他們支持中國融入世界。也就是說，中產階層總體「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在溝通國內外聯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們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支持者」<sup>⑲</sup>。

然而，中產階層內部就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何種作用卻存在爭議。造成這一爭議的原因主要有兩類：一是不同的利益訴求造成了不同的偏好；二是個體所擁有的資源及其賴以活動的制度內在地影響着其偏好<sup>⑳</sup>。「政治—市場」共變機制下的中產階層內部各群體，在資源獲取上既有相互利用、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衝突的一面。其利益來源的不同、擁有的社會資本不同，以及所賴以活動的制度不同，造成他們不同的國際觀。同時，中國政府現有解決問題的思路，無論是國內的三農、醫療、教育改革、社會安全保障問題，還是國際外交問題，其所依賴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央財政能力的強大<sup>㉑</sup>。而中產階層對待經濟高速增長和中央財政能力這兩方面的不同態度，又進一步造成了其國際觀的差異。

政治型中產階層的社會資源來源主要是政治原則主導的制度，主要依

中國中產階層並非像西方中產階層那樣是同質性很高的白領階層。中國中產階層是個「雜領群體」，主要表現為新、舊中產階層同步發展，又存在於不同的行業、職業和所有制之中。

我們必須正視中產階層內部的異質性，如在文化價值觀上，市場型中產階層更強調競爭、個體主義、物質主義、效率、工具理性；而政治型中產階層則更傾向於謙虛樸實、集體主義、道德主義等。

靠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因此，他們認同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更傾向於支持中央財政能力的強大。這樣，通過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他們就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同時，由於他們具有的資本偏向於政治資本，而政治資本在與經濟資本的市場化競爭過程中處於劣勢，從而促使他們更傾向於保守主義的措施，即盡可能地減少以外資為主的國外影響在國內的發展，甚至會利用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經濟主權等這些極端的口號來達到排外的目的。所以，在贊成中國參與世界、發展中國經濟的同時，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實力還不夠強大。在太多國內事務的羈絆下，中國應該專注於發展內部，而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與資源投放到國際社會；不贊成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而應該是「搭便車」者；對中國外交戰略更多地強調的是「韜光養晦」，較具有保守主義的國際觀。

市場型中產階層的社會資源來源主要是市場原則主導的制度，主要依靠社會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同時，他們具有的資本偏向於經濟資本，而經濟資本在市場化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從而促使他們更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目標，即歡迎外資的進入，甚至是借用外資的影響打破國有資本的壟斷地位，更傾向於私有化和產權明晰。因此，他們不僅僅認同經濟高速增長，更強調市場分配資源的主體性。在國內層面上表現為強調減稅，尤其是減免關稅，而對中央財政能力關注度則不高。在國際層面上表現為認同「走出去」戰略，要求國家積極參與國際市場，並渴求國家保護其海外利益。例如，在世界貿易談判中，作為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在打開國

外市場向中國產品開放方面具有重大利益。

同時，有別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中國的貿易利益具有廣泛性的特徵（如中國的產品並不像阿根廷在農業領域這一特定領域具有集中的利益）。也就是說，在世界貿易中，中國具有為其出口產品尋求市場的「進取性利益」（offensive interests），又具有保護其自身市場的「防禦性利益」（defensive interests）<sup>②</sup>。因此，他們認為參與國際事務不僅僅給中國帶來一個最重要的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渠道，而且在處理經濟全球化方面能給中國帶來一個發揮其影響力的舞台；從而要求中國不僅僅做國際社會的參與者，更要承擔起國際責任，扮演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角色。他們不但支持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更要求中國外交「有所作為」，較具有自由主義的國際觀。

中國中產階層的國際觀是結構性的：外層是暫時性的、易變化的；內層則是較穩定的、基於利益取向的。也就是說，表面上中產階層的態度較容易發生變化，但內心深處卻存在着相對穩固的利益和政治取向。我們必須正視中產階層內部的異質性和研究中產階層內部不同部分的政治態度，如在文化價值觀上，市場型中產階層更強調競爭、個體主義、物質主義、效率、工具理性；而政治型中產階層則更傾向於謙虛樸實、集體主義、道德主義等。

#### 四 中產階層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過程既產生更大影響，也受到更大的關注；

外交決策既受到更廣泛的、來自社會和國際的各個方面的制約，也受到各個部門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sup>33</sup>。一些敏感的國外學者已經觀察到，中國外交決策層對公眾的觀點愈來愈敏感，並且這些公眾通過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要求把他們的利益反映到政策制訂過程中，其中正在崛起的中產階層將產生顯著的影響<sup>34</sup>。

中產階層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對於政治活動的開展有較多的了解，往往較多地參與政治活動，也可以說成是他們算計到自己的經濟和社會權力，認為可以加以有效地利用以獲取政治上的好處。在中國國內進行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水平與政治參與意識和積極性之間存在正比例關係<sup>35</sup>。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也呈現出功利性較強、以個體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等特點<sup>36</sup>。因此，同低收入階層相比，中產階層在資源、能力等各方面都傾向於表達其利益，具有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

中產階層主要可以通過兩類方式介入對外事務，以影響決策層、國際事件和其他國際行為者。

### (一) 國內渠道

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中產階層表達其偏好的一個主要途徑。按其參與的性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制度性參與；一是非制度性參與。前者涉及政府體制，並且通常屬於常設機制，可以直接參與政府外交決策以及制度化協商，具有內部輸入的特點。後者則涉及政府與社會的互動，主要指中產階層利用其掌握的資源通過非正式渠道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和個人施加影響。

制度性參與具有主導性。首先，許多中產階層參與了各級人大、政協、政府以及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制度性參與者。中國的政治制度為中產階層提供了廣泛的參與渠道，並且，中國還存在着「次國家政府的國際行為」或「次中央外交」。一方面，次國家政府和組織日益介入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制訂過程；另一方面，次國家政府和組織開展了愈來愈廣泛的國際活動<sup>37</sup>。因此，中產階層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其中。

其次，中產階層中的精英份子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外交部的智囊人物，直接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例如，歐洲理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執行主任萊昂納德 (Mark Leonard) 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分為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國際主義兩派，對中國外交政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sup>38</sup>。趙全勝認為知識份子和思想庫通過多層次的聯繫渠道對中國外交政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sup>39</sup>。外交部建立的專門的、範圍很小的專家諮詢庫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創立的學習制度等制度安排，都直接為中產階層中的精英份子提供了影響對外政策的渠道。

再者，中產階層成員加入了各種專業協會，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他們通過這些協會把訴求反映到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老練的退休外交官加入了各種專業協會及團體，他們與外交政策機構之間存在着廣泛的個人聯繫，因此，這些專業協會及團體對外政策方面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最後，通過內參——這是施加影響的傳統方法，即直接向中央遞交內部報告。如中產階層可以直接向各級

外交部建立的專門的、範圍很小的專家諮詢庫，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創立的學習制度等安排，都直接為中產階層中的精英份子提供了影響對外政策的渠道。

中國中產階層通過非政府組織，在一些議題、議程中積極地活動，通過游說，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和個人施加影響，從而對政策造成某種壓力，以使對外政策照顧到其利益。

決策者提交政策分析和建議，其中一些可能上達中央領導。

非制度性參與也同樣重要。財富和權力來源的多元化導致中產階層地位上升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政治參與渠道，這主要體現在非制度性參與。

第一，網絡。互聯網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特別是中高階層社會成員收集信息、交往、工作和生活的一種重要手段<sup>④</sup>。中國中產階層是互聯網用戶中的主力<sup>⑤</sup>。2008年4月，因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干擾而激起的中國網民的反法情緒，促使中法兩國都派出高級代表修補雙邊關係，這表明網絡對外交政策具有極大的壓力。

第二，大眾傳媒。中產階層往往控制着全國性的媒體，引領着文化潮流，把他們所倡導的價值態度向全社會傳播<sup>⑥</sup>。因此，中產階層往往通過媒體報導或不報導哪些「議題」，是否突出強調某些「議題」，以及對所強調的「議題」進行排序，從而把其外交政策取向反映出來，對外交政策造成輿論壓力。例如，學者可以通過電視談話節目、學術出版物等就外交政策進行解讀及評析。

第三，非政府組織。各類在民政系統註冊的民間組織已經不計其數，並且還存在着大量的、無需在民政部登記的「草根組織」，比如在學校、街道、鄉鎮內開展活動的社團。中產階層通過這些非政府組織，在一些議題、議程中積極地活動，通過游說，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和個人施加影響，從而對政策造成某種壓力，以使對外政策照顧到其利益。

第四，民意調查。民意調查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展開，民意

調查的主體主要是各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學術研究組織。1990年代後，大量商業化運作的調查公司開始興起並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如零點研究諮詢集團。中產階層可謂是這些調查機構的主力軍，通過這些民意調查，中產階層把其觀點與傾向潛移默化地影響一般的家庭和公民，進而影響政府的政策和外交的內涵。例如2008年5月1日，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就直接引用零點調查的數據說，有80%的中國人表示對西方抱有惡感，要求西方各國努力改變中西民眾情緒對立的現狀<sup>⑦</sup>。

制度性參與使中產階層能夠在合法、穩定的渠道下，使其利益得到表達。而在制度化機制尚未形成或還不發達的情況下，非制度性參與以其較強的隨機靈活、形式多樣性使得中產階層可以自由地關注和評論各種自己關注的國際事務。但非制度性參與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即並不能滿足中產階層參與的熱情和渴望以及非理性參與。同時由於很難把非制度性參與納入到制度化磋商機制，從而導致政府外交的統一性、有效性受到挑戰。

## (二) 國際渠道

在國際交流迅猛發展的情況下，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的跨國交流，因此，中產階層可以參與許多跨國交流，並對外採取行動，進而影響外交事務。

第一，全球中產階層網絡。全球化下，通過移民、投資或工作流動，中產階層愈來愈頻繁地跨越邊界進行流動，甚至形成了一個全球中產階層網絡<sup>⑧</sup>。同時，在國際層面上還存在着一個國際倡議網絡，主要由具有相同知識背景和相近價值觀的知識界組

成，他們在許多國際政策領域提出了規範標準，這些規範標準成為一種創新擴散的機制<sup>⑤</sup>。於是，中產階層可以通過全球中產階層網絡及國際倡議網絡中的行動來影響中國對外政策。

第二，海外公司。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愈來愈深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經濟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中國的一批優秀企業也在積極「走出去」。在這些海外公司就業的中產階層通過與所在國政府和民眾的接觸，間接或直接地影響了中國對外政策。同時，國內存在眾多的外資企業和龐大的外資企業員工，其中大多數為中產階層。一旦國外政府與中國存在政策紛爭，其利益與意志能夠在中國國內找到對應的社會基礎，即已經進入中國的國際資本（外資企業）及與其利益攸關者（就業於外資企業的人員）。對中國政府而言，外資企業及其員工將成為一種新的傳遞外來壓力的渠道。

第三，國外對中國中產階層的關注。實際上，公眾對待國際事務的態度在任何國家的外交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在於，中國正在經歷中產階層的急劇上升，以至於海外媒體、民眾、社會組織及國外政府都注意到了此趨勢，並作出了不同的反應。例如，新西蘭外交貿易部部長說，鑒於中國中產階層急劇增長，中國對農產品的需求上升，新西蘭應該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從而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發達國家<sup>⑥</sup>。而許多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更是把發展中國家中產階層的增長作為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府進步的基本標誌，是減少國內衝突的重要手段，更是實現全球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關

鍵<sup>⑦</sup>。實際上，這些來自國外的關注不僅僅引起了國外政府的注意，也引起了中國政府及社會對中產階層的注意，從而在對外政策中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壓力乃至威懾作用。

總之，作為相對獨立的外交決策進程的參與者，中國中產階層的國際活動對政府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能力產生了複雜的影響。消極方面典型地表現為，中產階層的國際活動會干擾乃至損害政府實現其外交目標的能力，政府不得不動員大量的外交資源在國際上進行圍堵，從而限制了政府在其他外交議程領域中追求國家利益的能力。而積極方面則表現為，中產階層所擁有的從事國際活動的各項資源，如果能夠與政府外交相互配合使用，可以用來支持政府實現其外交目標，增強政府外交的有效性。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國內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分層的明顯化，外交受國內政治影響的力度會愈來愈大，中產階層所扮演的角色將愈來愈重要。

中國中產階層所擁有的從事國際活動的各項資源，如果能夠與政府外交相互配合使用，可以用來支持政府實現其外交目標，增強外交的有效性。隨着時間的推移，中產階層所扮演的角色將愈來愈重要。

## 五 探討與展望

傳統上，社會學者往往把中產階層和政府看作對立的，讓中產階層頭上閃爍着某種自由主義的道德光環。正因為此，人們對於中產階層的標準和判斷，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期許和責任冀望，甚至往往把對公共政策的批評和反省責任賦予中產階層身上。然而，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社會，政府所制訂的政策對於社會發展有着巨大的影響，以至於可以改變社會結構<sup>⑧</sup>。當代中國中產階層很難根據自身的環境和生存條件，而獲

得完全超越於政府的獨立空間和批評舞台，尤其是難以通過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來獲得獨立的批評資格。在缺乏資源支持的時候，中產階層往往必須依附於體制，形成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因此，對於中產階層與政府而言，主要命題已經不再是中產階層與政府的關係，而是中產階層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問題。討論中產階層與政府的關係，其實就是一個領域中的中產階層與另一個領域中的中產階層的關係。

當代中國中產階層很難根據自身的環境和生存條件，而獲得完全超越於政府的獨立空間和批評舞台，尤其是難以通過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來獲得獨立的批評資格。中產階層往往必須依附於體制，形成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

今後對中產階層的研究有四點需要特別關注：首先，第二代中產階層。目前，第一代中國中產階層的子女已經成長起來。尤其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下，第二代中產階層不像父母輩那樣，他們是在一個中產階層家庭環境下成長，有媒體把他們稱作寵壞的一代，他們的傾向更需要我們研究。如中國「80後」、「90後」青年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

其次，中產階層精力轉移傾向。恩蒙(Abdul R. Embong)指出，馬來西亞的第一代中產階層都醉心於物質上富足<sup>④</sup>，而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也大都追求經濟上的滿足感，精力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但這並不能保證中產階層的精力永遠不會轉移到其他領域，尤其是一旦經濟發展陷入困境乃至停滯，中產階層的精力將會發生轉移，從而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再者，政治型中產階層與市場型中產階層的相互轉化。依據體制內的優勢，政治型中產階層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或許才最到位、最有力。一旦政治型中產階層轉向市場型中產階層，進而批評政府政策，此影響更非一般中產階層所能言。

最後，中產階層與國際力量的互動。儘管中國政府在推動經濟和社會轉型中一直扮演着關鍵性角色，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忽視國際因素的作用。實際上中國還經歷着第三種轉型，即從一個非世界貿易組織(Non-WTO)國家向世界貿易組織國家轉型。而中產階層如何與國際資本、國際商業網絡等這些國際力量互動，則會對中國轉型乃至中國外交產生重大影響。

### 註釋

①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曾專門就中國中產階層做了一個特別報告，詳見魏城：《所謂中產：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對中國中產階層的調查》(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②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③ 蘇長和：〈發現中國新外交——多邊國際制度與中國外交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頁11-16。

④ 朱立群：〈觀念轉變、領導能力與中國外交的變化〉，《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頁9-20。

⑤ 戴建中：〈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及私營企業主研究〉，載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新領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6)，頁524。

⑥⑦ 周曉虹主編：《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8。

⑦ 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載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387-90；另參見David S. 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4。

⑧ 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4 (2000): 1135-74.

⑨ 孫立平：〈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載《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頁99-108。

⑩ 邊燕杰：〈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載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106。

⑪ 劉祖雲：〈社會分層的若干理論問題新探〉，載《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頁274。

⑫ 李培林：〈新時期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頁47-63。

⑬ 呂大樂：〈白領：新興的中產階級〉，載《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頁374。

⑭⑮ 李春玲：《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01；511。

⑯ 林南著，張磊譯：《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4。

⑰⑱ 陳義平：《分化與組合——中國中產階層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100-102；172-74。

⑲ Katherine Verdery,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per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ed. Kjell Goldmann, Ulf Hannerz, and Charles West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96.

⑳㉑ 朱立群、趙廣成：〈中國國際觀念的變化與鞏固：動力與趨勢〉，《外交評論》，2008年第1期，頁19-23；23。

㉒ Kenneth F. Scheve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What Determines Individual Trade-Polic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 issue 2 (2001): 267-92;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 "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 A Hierarchical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no. 4 (1987): 1099-1120; Eugene R. Wittkopf,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n Alternative View",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2, no. 1 (1981), 108-23.

㉓ 盧春龍、田野：〈中國城市居民對經濟國際主義的支持：強度與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9期，頁62-70。

㉔ 孫永芬：〈政治心態與影響因素間變量關係的實證分析〉，《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1期，頁62-67。

㉕㉖ Eugene R. Wittkopf,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109-10; 115-21.

㉗ Alastair I. Johnston, "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9 (September 2004): 607.

㉘ Alastair I. Johnston, "The Correlates of Beij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98-2004",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ed. Alastair I.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1.

㉙ 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J. Hiscox, "Learning to Love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issue 2 (2006): 469-98.

㉚ 米爾納(Helen Milner)著，蘇長和譯：〈政治的理性化：正在顯現的國際政治、美國政治與比較政治研究的綜合〉，載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編，秦亞青等譯：《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41-74。

㉛ 賀照田：〈論知識份子對國家權力態度的轉變(上)〉，《南風窗》，2008年第8期，頁92-95。

⑳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 in Geneva: Lessons from China's Early Year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47.

㉑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探尋新的視角與解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68。

㉒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341-70.

㉓ 蔡定劍：〈「中國人素質太低，搞不了選擇」質疑？〉，載蔡定劍主編：《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頁199-261。

㉔ 汪永成：〈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取向與執政黨的發展——基於一項調查的分析〉，載黃衛平、汪永成主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III》（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86-90。

㉕ 陳志敏：《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頁317-30。

㉖ Mark Leonard, "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 *Prospect*, issue 144 (28 March 2008), [www.prospect-magazine.co.uk/2008/03/chinas-newintelligentsia](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2008/03/chinas-newintelligentsia).

㉗ 趙全勝：〈知識份子和思想庫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載郝雨凡、林甦主編：《中國外交決策：開放與多元的社會因素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51-69。

㉘ 張文宏：〈中國的社會資本研究〉，《社會學》，2007年第9期，頁10。

㉙ Jens Damm, "The Internet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9, issue 2 (2007): 273-94. 有關互聯網與中國社會變遷及政治影響，參見 Jens Damm and Simona Thomas, eds., *Chinese Cyberspace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Political Effe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John Lagerkvist, *The Internet in China: Unlocking and Containing the Public Sphere* (Lund: Lund University, 2006)。

㉚ 參見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的演講，Fu Ying, "Speech at the Launching of 'Young Icebreakers'" (1 May 2008), [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sghd/t433051.htm](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sghd/t433051.htm)。

㉛ 例如全球資本家階層的出現已經引起了社會學家的注意。詳見 William I. Robinson and Jerry Harris, "Towards a Global Ruling Clas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cience and Society* 64, no. 1 (2000): 11-54。

㉜ Beth A. Simmons and Zachary Elkins, "The Globalization of Liberaliz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no. 1 (2004): 171-89.

㉝ Lee H. Teslik, "China Looks Down Under" (14 April 2008), [www.cfr.org/publication/15976/china\\_looks\\_down\\_under.html](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5976/china_looks_down_under.html).

㉞ Walter R. Mead and Sherle R. Schwenninger, "A Financial Architecture for Middle-Class-Ori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ed. Walter R. Mead and Sherle R. Schwenninger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1-83.

㉟ 李強：〈政策變量與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調整〉，《社會學》，2007年第12期，頁60。

㊱ Abdul R. Embong, "Middle Class Politics,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in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e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aipei: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337.